

听任钧谈往事

◆ 韦泱



■ 诗人、翻译家
任钧 韦泱 摄

二十多年前，有诗友问我：新诗百年的发展历史上，谁是上海资格最老的诗人？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任钧先生。那时他已八十开外，住在松江老年福利院，我常去看望他，面聆教益。我总是缠着他，要他讲讲过往的经历，他总是微微一笑，还幽默我一默：“那都是十八世纪的事了，说它干吗。”但还是拗不过我，娓娓道来。

幸遇贵人

任钧(1909—2003)原名卢奇新，后改为卢嘉文，笔名卢森堡或森堡、孙博、孔堡等，广东梅县隆文乡文普村人，出生在印尼西里伯斯小岛，母亲生下他仅五十三天就突然病逝。祖母在他五岁多时，把他带回了中国，在家乡梅县读完小学，考入广益中学，又转入东山中学。有个同班同学叫冯宪章，说起他，任钧充满感情地说：“冯先生是我的贵人啊，没有他，哪有我以后的文学和人生哪！”1925年，在冯宪章的介绍下，任钧在广东参加共青团，1927年转为中共党

的一家素食馆，大家漫不经心地边吃边聊，互相交流着，表面上看不像开会的样子。

第二年，任钧去了日本，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。不久，蒋光慈来到日本短期养病，找到先期到日本的冯宪章、任钧、楼适夷，以及留学生中的青年作者谷公尧、伍劲锋等，成立了太阳社东京支社。

编辑出版革命文学刊物，是太阳社的主要任务。那时，太阳社成员洪灵菲、杜国庠、戴平万等，在上海又组成了我们社，作为太阳社的姐妹社，出版《我们月刊》。除《太阳月刊》《我们月刊》，还改刊或新办的有《时代文艺》《新流月报》《拓荒者》《海风周报》等，任钧就在这些刊物上经常发表作品。

左联工作

1930年3月左联成立，第二年初，叶以群来到日本，成立了左联东京分盟，任钧就参加了这个组织。任钧把诗作《我听见了飞机的爆音》译成日文发表在日本文学刊物上，同时，撰写日本进步作家访问记，寄回上海，在《文艺新闻》上连载。1932年，任钧回到上海，找到左联党团书记丁玲，接上了组织关系。9月，经任钧倡议，得到左联批准，与杨骚、穆木天、蒲风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，创办会刊《新诗歌》，旗帜鲜明地提出诗歌“现实主义的大众化”口号。这一主张，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肯定和指导。这一时期，任钧在新诗创作上，特别重视“听觉艺术”，诗作多以歌谣、小曲的口语形式，很适合朗诵。

第二年，周扬接替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，胡风任宣传部长，任钧任组织部长。任钧说，在左联期间很艰辛，既无办公地点（经常在狭小的过街楼上周扬家中碰头），也无工资收入，大家只靠微薄的稿费度日。虽然鲁迅、茅盾也在上海，但不参加一般活动，过段时间，大抵在四川路上鲁迅居处附近的饭店约见。每次都是鲁迅抢着买单，大家不好意思，说分摊吧，也即现今的AA制，鲁迅笑笑说：“我的稿费毕竟比你们多呀！”

1934年，他先后被国民党逮捕过两次，依然没有暴露真实身

份。经保释出狱后，从此离开了左联，也失去了党组织关系。之后，笔名卢森堡或森堡就在文坛消失，代之以任钧的笔名，出版了现代诗坛第一本讽刺诗集《冷热集》、以抗战为主题的《战歌》诗集。此后，还翻译了高尔基《爱的奴隶》《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》等。1949年后，任钧曾任《人民诗歌》月刊编委，长期在上海音乐学院、上海师范大学任教。

忘年之交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加入上海作家协会，后在诗歌委员会担任不拿任何报酬的小干事，却有机会接触到上海的老诗人。此时，任钧已八十高龄，住进松江老年福利院，写些创作回忆。我经常去看望他，成了“忘年交”。晚年的他，颇感寂寞，除了子女，一般很少有像我这样的人去打扰他，还问这问那。他好奇地问我：“在哪里工作？”我说在建行做企业文化工作，他高兴地说：“我儿子也在建行哎！”

除了听他聊聊过往，还跟他谈谈家常。他说，无论遇到什么困苦，再艰难的处境，他都想得开，照吃照睡，才能有好的身体去应对。他个头不算高大，精神挺好。有次，我带去他民国年间出版的《新诗话》和《任钧诗选》，他一看眼中放光，惊喜道：“你还有这书，保存得这么好！”我说都是从旧书店淘来的。他接过我的笔，为我一一签名。还有一次，我请他写几个毛笔字，他笑着说，我从不写毛笔字的，说着就写了起来：“诗言志，没有生活，便没有文学艺术”。并说，这话到现在也不过时。此年他已九五高龄，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手迹。那天我正巧带着单反相机，就给他拍了一张阅报的照片。神态自然，他很高兴，说这是最满意的照片。不曾想，这也成了我们最后的聊天。一个月后，老人突患感冒引起并发症，不及抢救而去世。在追悼会上，挂的像就是我为他拍的这最后一张肖像照。

2020年，有出版社要重版任钧译著《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》，编辑苦于找不到家属授权，辗转找到我，终于完成了此书的出版。这一切可以说是我与任钧先生的缘分使然。

王元化与老师王遽常

◆ 王大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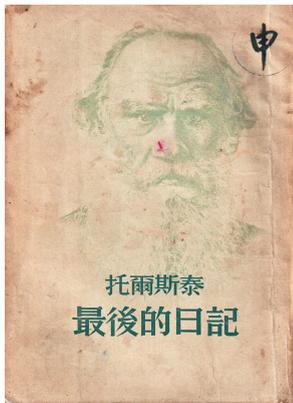
带，一次，他上完课走出教室，见走廊地板上流淌着一摊血迹，腥风血雨，波及校园。听了遽师一番话，两人相对唏嘘。

那段时间，有时下午王老工作劳累了，我就会陪他去散步，会碰到遽常先生由王平孙兄陪同也出来散步。王老见到遽师，总是趋前请安，聊上几句话，执礼甚恭。我与平孙兄渐渐熟识，我说，这段师生情缘殊为难得，可否请遽常先生给王元化写点东西，留个留念，平孙兄说：“好啊！”但又说，老人患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，最近身体不适，手总是不住地颤抖，待稍微好点，就让他写。未几，平孙兄交给我一张遽常先生的书法，展开见上款为“元化张可贤伉俪嘱”，书写的四个草草字体沉稳古朴、醇厚饱满，书法线条老辣自如，出神入化，当代“草圣”，名不虚传。我端详老半天见是“蘋洲某语”，其中第三个字始终读不出（附图），为此请教沪上几位书画名家，皆不得识，甚至请教云天兄，亦不能辨，令我一筹莫展。思忖半天，只好叩问遽常先生，老人听了我的来意，微笑着说，这是燕子的“燕”字啊！又请教“蘋洲燕语”释义，老人说比喻琴瑟和鸣、夫妻恩爱。之前，读过王元化撰《女性赞》一文，讲到十年

内乱灾难中，许多女性都和影片《天云山传奇》中冯晴岚一样，甘愿默默地作出自我牺牲，相信自己的亲人是正直的。当年王老被打成胡风分子，受到一年零八个月的隔离审查，患上因性精神病，经张可师母精心呵护，得以康复，后在逆境中能写出《文心雕龙创作论》等享誉海内外的鸿篇巨作，张可师母功不可没。遽师题赠“蘋洲燕语”，可见对他们的赞赏。王老获赠墨宝后，如获至宝，嘱我赶紧去裱褙配上镜框。当年王老客厅只悬挂两幅作品，一幅父亲芳荃公书法，另一即遽师的印章。

记忆中，还有一件难忘的事。有段时间，坊间对王元化的境遇有所传言，也传到遽常先生耳中，他很着急，但又便当面询问，便带信要我去一次。他焦急地问我，外面传言是否确切？我告诉他不正确。随之我就向王老汇报，王老听完我话当即说，我去看看老师，免得老人担心牵挂。见到遽师后，王老说：“老师，没有问题。”遽常先生说：“你没有什么事，我就放心了！”短短数语，师生情深可见一斑。

1989年10月25日，遽常先生因心脏病突然逝世，王老震惊得说不出话来，泪流如注。遽师追悼会上，他以受业弟子身份致了悼词。此后一段时间，他仍然被悲痛裹挟，不能解脱，常常看着墙上的遽师遗墨而陷入沉思。他不是欣赏书法，而是强烈地感受到老师的关爱之情，仿佛听到了那颗真诚炽热的心跳。



■ 任钧译《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》书影

员。梅县暴动失败后，他俩受到通缉，侥幸逃出。冯宪章历经周折来到上海，考入地下党主持的上海艺术大学，结识了蒋光慈、阿英等，并加入太阳社，接连发表诗作，出版了诗集《梦后》。

任钧说，冯宪章去世太早，后来不大为人所知。1928年秋，得知冯宪章要东渡日本留学，任钧写下《送行曲》，登在《海风周刊》第十期，以“我们的喉咙要始终被践踏者而叫号，我们的热血要始终被践踏的大众而奔流”给予勉励。由于在中国留学生中建立党组织，冯宪章被当地政府逮捕、拘留，并驱逐回国。后在一次示威游行中，1931年初夏死在漕河泾狱中，年仅二十三岁的党员作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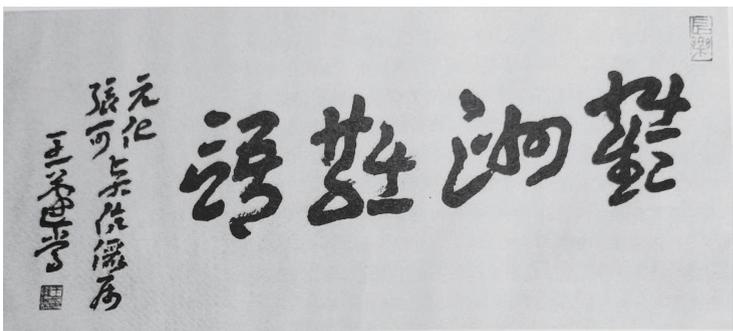
在太阳社

1928年5月，在冯宪章帮助下，任钧也来到上海，并考入复旦大学。不久，冯宪章又介绍他加入了太阳社。这是我党第一个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张的文学团体，其成员大多是中共党员。由于白色恐怖，很少集中开会，任钧记得大的会议只有一二次，是在霞飞路（今淮海中路）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王元化担任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。1955年出版社卷入反胡风运动漩涡，他受到牵连，被调到作协文研所，其间私下与熊十力、韦卓民、郭绍虞等往来，向他们请益，这些已为人们熟知。然而，他晚年还有一位失散几十年又偶然相遇的老师，却很少为人提及，是为学者、书法家王遽常。当时笔者在王老身边工作，了解事情始末。

1986年，王老卸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后，迁居吴兴路246弄1号楼。隔年，二楼搬进一位身材魁梧、行走有点不便、说话带浙江嘉兴口音的老人，据开电梯小姑娘说他叫王遽常。听到王遽常这个名字，有如雷贯耳之感，他以“秦史”研究闻名，又以擅书草草驰名中外，东瀛书坛更有“古有王羲之，今有王遽常”一说。而王老的话更使我惊讶不已。他说，王遽常先生还是他的老师。原来，抗战中，上海沦为“孤岛”时期，十七岁的王元化考入大夏大学攻读经济学，王遽常在大夏讲授先秦诸子哲学，教过他的课。王老补充说，但他辜负了遽师厚爱，没有如愿将学业完成。由于国家民族危亡，他走上职业革命家的路径，在这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地下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位领导人。自从离开学校后，他与遽师再无往来，现在居然住在同一幢楼，确是师生有缘。王老又说，要寻找机会去拜见老师。据王遽常晚年高足王运天兄后来告诉我，一天傍晚，遽常先生下楼到信箱拿报纸，与王元化相遇，王老即趋前向遽师问候，并作了自我介绍，师生得以相认。

因缘巧合，不久值遽师执教65年暨九十华诞。那天上午，王老嘱咐我去徐家汇花店订购一个大花篮，又吩咐我展砚磨墨，王老挥毫在花篮绸带上写了上款：“遽常老师九十寿辰大庆”，下款为“受业王元化暨妻张可率子承义敬贺”。其时王老哲嗣王承义兄在海外深造，凡遇礼仪活动，王老都写上其子名字。然后，由我捧着花篮，随同王老和张可师母去二楼遽常先生家。遽常先生幼子王平孙兄开门，看到王老夫妇，喜出望外。进入客厅后，见房内已摆放不少鲜花，墙上悬挂着顾廷龙书写的繁体“寿”字，处处洋溢着生日的欢庆氛围。遽常先生安详地坐在宽大的写字桌后面，王老恭敬说：“老师，祝贺您九十寿诞，并祝您长寿！”遽常先生笑呵呵答道：“您的祝贺使我延年益寿！”据传遽常先生眼界很高，他接说的话得以印证：“虽然我的腿行走不便，但我的志向仍在千里之外。”随后，师生俩把臂欢晤，相谈甚欢，都是家常话。但谈及“孤岛”往事，话题有点沉重。遽常先生回忆，大夏校址即今日的南京西路梅龙镇酒店一



■ 王遽常书赠王元化和张可夫夫妇“蘋洲燕语”